

文章编号:1674-8107(2019)01-0064-06

# 革命与话语:苏区动员的语言载体形态与特征

谭琪红<sup>1</sup>,向绪伟<sup>2</sup>

(1.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2.南昌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语言载体是人类重要的传播媒介和传播符号。在文化相对滞后的中央苏区,中共充分运用音乐歌谣类、戏剧舞蹈类、谈话讲演类的语言载体进行民众动员和宣传鼓动。这些语言载体充分呈现了信息传播与教育认知相统一、情感沟通与艺术表达相统一、价值灌输与思想启蒙相统一的特点,迅速快捷有效地传播着中共革命文化、革命情感和革命价值的红色文化,发挥着认知、沟通、调适、慰藉、激励和凝聚的功效。

**关键词:**中央苏区;语言载体;形态;特征;功效

**中图分类号:** K263.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9.01.010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sup>[1](P839)]</sup>。革命需要民众力量的整合,语言是整合民众力量最有力的手段和载体。尤其是在民众认知能力和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语言的话语魅力和威力也更强。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中共在声势浩大的苏维埃运动中,利用独具特色的不同语言载体,掌握了苏区民众动员的话语高地,掀起了共克时艰的革命运动。

## 一、苏区动员的语言载体本质:人的力量的本质外显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在生产协作过程中产生,以人们的交往需要为内生动力的。人的认识活动自始至终都有语言的参与,语言符号是社会的人进行认识活动、表达认识成果、进行思维操作的感性手段、感性工具。语言符号和人的认识具有共同的来源并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发展,二

者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sup>[2](P269-270)]</sup>

语言载体在传统乡村社会所起的主导作用似乎更大。这是因为,边远落后的乡村,语言成为维系家庭伦理、乡村规范、邻里秩序的主导性载体<sup>[3]</sup>,其主导的意义在于使乡村中的主体与客体通过语言载体而不是其他载体得到最具有实效性的互动。语言载体(不含书面语言)有其独特的传播优点:言语是最便捷、最普遍的教育载体;言语是最生动、最直接的教育载体;言语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成本较低。这些优势在苏维埃时期也充分发挥了认知、教育和审美的功效。

从这个角度来呈现中央苏区那个特殊时期的传播形态,可以得出,在狭小的空间传播苏维埃的理念,声音传播形态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何况对于文字、印刷术、电报、电话、电视、电脑等传播形态的匮乏,使得语言功能的延伸和伸展就有点捉襟见肘。

苏区革命环境中大量的语言载体的运用,在

**收稿日期:**2018-09-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日常叙事的结构分析与效用模型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YJA710025);江西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载体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7XW01);江西省高校党建一般项目“江西高校强基工程的制度设计与路径优化”(项目编号:JXGXDJKT.GH-201510)

**作者简介:**1.谭琪红(1979-),男,江西九江人,副研究员,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

2.向绪伟(1972-),男,河南光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研究。

重要的时空及舞台上进行着话语表达。这是因为有声语言首先是最便捷、最普遍的思想教育载体。语言无需什么成本,仅靠人的发音器官,靠空气、声波,即可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因而是最便捷的。语言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它与人类社会相始终。斯大林说过:“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凡有人的地方就有语言,因而也是最普遍的。其次,语言是最生动、最直接的思想教育载体。除了语言符号之外,表情、手势、姿态、动作、服饰等非语言符号,也在传递大量思想信息。由于语言符号是与非语言符号相伴而生的,因而能赋予语言载体以亲切生动、易于理解的优点。

语言的发展不断地提高人的认识能力,而人的认识能力也在提高的过程中创造并发展着语言,使语言的抽象化程度不断加深。一旦离开了苏区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的生产与交往,苏区特有的话语符号与体系既不会产生,更不会发展。苏区的语言载体作为历史的交往实践的产物,实际上是苏区社会民众力量的本质体现。这种话语所掌控的“口头宣传”在1929年《宣传须知》中就被红四军前委赋予重要的使命,要求面对“工人、农民、士兵、穷人、学生及商人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时,不能仅靠单调一致的“口头禅”或“呆板的口语材料”打动或感染他们,而应有技巧地、艺术化地处理语言载体。“简易的文化娱乐工作和鼓动方式,读报,识字,唱歌,猜谜,识革命故事等”<sup>[4](P575)</sup>语言载体在战地和后方展开,这些语言传播形态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能寓教于乐,坚持价值性和艺术的结合,在极大地丰富了苏区人民生活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的价值观和革命立场。

## 二、苏区动员的语言载体形态

在如火如荼的苏区社会变革中,苏区军民创作了数以万计的歌谣、数百部戏剧,他们用戏剧、山歌、民歌、民谣等形式讴歌战斗生活,赞美苏维埃建设,就在短短数年内创作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各类作品,堪称文学史上的奇迹。<sup>[5](P79)</sup>在中共的主导下,民众迅速接受和认同了这些蕴藏着巨大能量的语言类载体。

### (一)苏区音乐歌谣类:苏区民众喜闻乐见的

### 语言艺术载体

苏区的音乐歌谣是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最能抒发革命豪情和进行广泛传唱,它是革命老区人民的心声,是劳动人民感情的真实记录,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鼓舞作用<sup>[6]</sup>。苏区歌谣是苏区人民用来表达自己所思所想的重要方式。他们用自己熟悉和喜欢的文艺形式反映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感情真挚,艺术感染力强,而且他们在歌唱时还使用了比兴、叠句、对歌、夸张、讽刺等艺术手法,使得效果更加明显。“革命山歌之于苏区人民的密切关系,是因为人民群众既是山歌创作和演唱的主体,同时也是山歌演出的受众,接受宣传的对象。在主体和受众当中,妇女都是最重要、最活跃的成分”<sup>[7]</sup>。“它是农民作者用自己的语句创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心坎里面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是人民大众所欣赏的艺术。”<sup>[8](P38)</sup>这从一些老红军那里也得到印证,“一般的说,唱歌、读报、猜谜等在部队中是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使长途行军时,战斗员并不感觉疲劳。”<sup>[4](P575)</sup>突出重围,一听到老乡的山歌,我们的疲劳困倦霎时无影无踪了,很多战士便兴高采烈地与老乡们对唱起来<sup>[9](P117)</sup>。

### (二)苏区戏剧舞蹈类:特定时空舞台的革命性话语

苏区戏剧反映了苏区民众精彩的文艺生活,反映了民众豪迈乐观的精神面貌,充分体现了军民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小歌舞剧、活报剧、快板、双簧、相声等红色戏剧纷纷上演,为当时的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服务。归纳起来有七种类型:1.歌表演;2.歌舞活报;3.歌舞小戏;4.舞蹈;5.灯彩杂扮;6.舞剧。据赵品三、石联星等回忆:它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中最新创造的一种戏剧形式。<sup>[10]</sup>7.活报剧。活报剧是苏区戏剧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活报剧的创作往往配合当时政治任务,剧本内容大都反映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常常把当事人组织起来进行真人真事的演出。演出方式灵活机动,强调现场的即兴发挥和群众参与,在当时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舞蹈是运用舞蹈语言、节奏、表情和构图等多种基本要素,以经过提炼加工的人体动作来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塑造出具有直观性和动态性的

舞蹈形象,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样式。无论是舞蹈还是戏剧,它们以唱、做、念、打为主要表现手段,以艺术和生活为原则,从生活中提炼概括虚拟原型,借助节奏、形象、表情等手段,表达情感的艺术语言载体,按照艺术美的原则,从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舞蹈化的特征。

苏区戏剧舞蹈掀起了苏维埃时代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性的革命艺术运动。这些经过改造的歌舞、新剧、活报不断地把所要传播的革命内容或教育主题改编为戏剧的节目,农民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红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sup>[11](P87)</sup>。在狭小的较为封闭的苏区根据地,戏剧舞蹈在特有的革命舞台上的排练与演出,成为红军部队和苏维埃政府最为广泛、最为活跃、最为丰富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 (三)苏区谈话讲演类:革命道理“灌输”的有效方式

人的自觉能动性理论,决定了理论教育产生的必然性。那么,人的科学理论观点、正确思想体系是自发形成的,还是自觉形成的呢?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针对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崇拜自发论的工联主义倾向指出,“广大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sup>[12](P29)</sup>。列宁当时提出从外面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强调了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学习、教育、宣传等自觉的方式才能掌握。

语言是一切文化传承的载体。语言载体作为“苏维埃”概念中国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害,对苏维埃运动的话语建构及进程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革命队伍及追随的民众而言,要使苏维埃理念深入人心,必须从百姓的实际生活出发,讲出百姓自己的话,并使之捍卫革命的成果而付诸行动。对于围剿的当政者,当然不希望“红祸”或“红匪之说”呈星火燎原之势,除了军事围剿之外,政治的歪曲或丑化或妖魔化就成为其政治围剿的选择之一。而对于中共而言,除了对革命民众加强“理念灌输”和宣传教育外,还需要用“武器的批

判”来摧毁或减弱“批判的武器”所造成的伤害或影响。因而,在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的文化传播基本是两条战线并行不背地进行。一条战线的重点是根据区域内的民众,另一条战线的重点是区域外的民众或白军士兵。在当时的时局背景下,语言的“灌输武器”和“批判武器”是中共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手段。谈话是个别思想政治教育或者是说是微观思想政治教育常见的一种载体,也是最主要的载体之一。

## 三、苏区动员的语言载体特征

语言符号是人类所特有的交流中介和沟通工具,是按一定的规则进行表达和交流思想意义的符号系统。中共所运用的语言载体除具备语言符号一般的特点外,还呈现出以下特征。

### (一)信息传播与教育认知相统一

人的认识的基本形式总体而言,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种。在两种认识形式的运动过程中经历感性认识与理论认识两个基本阶段,也就是人们由对事物现象的认识上升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其前提是必须全面客观地把握事物的现象。只有通过现象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sup>[13](P280)</sup>。特别是彼时的“中国一般文化程度的落后,中国工人识字的百分数是非常低的”<sup>[14]</sup>,如何使绝少从理论材料得到启示的民众能得到丰富的(不是零碎不全)和实际的感观材料,是革命者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没有这样的认知,是不会主动地、自觉地让民众认同革命的理论,更遑论主动投入革命洪流,从中共的发展初期,这就被革命者意识到。因此,化装讲演、活报,“蓝衫团”、戏剧等,都还是部分地开始使用,受到时任中央局宣传干事和红色通讯社负责人的杨尚昆的指责。杨尚昆甚至撰文要求“口头的、活动的宣传鼓动的方式应该很广泛地采用起来”,“内容还要大的改善,使它更通俗,更适合于群众的需要,尤其重要的是要吸收广大群众来参加这些工作,训练和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sup>[15]</sup>。一般说来,语言符号在人的认识活动中能使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信息交换成为可能。但是杨尚昆对苏区“许多宣传

队,拿着旗子在场中来回徘徊”成为“哑巴队”,“走几里路也不见他们开一声口”是不满的,因为没有起码的信息传播和对基本知识的教育,那“一般讲来,这些宣传队没有尽他应有的作用”。或许,语言载体的最起码的有效使用还没被重视,初期的“宣传队的成员”的素质和地位都是受到嘲讽的,这些“狗皮膏药”的人只会“贴标语或抄印上级指示”,这些宣传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讲,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讲话”<sup>[16]</sup>。

做人的工作也并非容易的事情,通过语言载体进行思想动员也是如此。除了基本的信息传播和意义传达外,尽量通过语言使受众知道信息之外涉及更深的利益诉求的因果,也就是语言表达要使受众“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做到信息表层与思维认知的统一,由自发变成自觉的认识过程。毛泽东曾说:“对于说服工作难度很大,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sup>[17](P197)</sup>。当然,除了军事的战略转移外,其他的工作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诸如通过政治讲演、科学讲演的语言传播来教育、宣传、组织民众。《俱乐部纲要》第六条提到讲演时,要求“题目当然要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的突击任务联系(政治讲演)。同时也针对着当地群众的旧习惯,具体的进行有计划的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改革风俗,改良卫生,研究生产(春耕秋收植棉等技术上的问题)等等的讲演(科学讲演)”<sup>[18]</sup>。

## (二)情感沟通与艺术表达相统一

现实的沟通时常受到人的认知、情感、态度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会传导和影响社会人际的沟通。人际沟通在完成了基本的信息层次外,就会逐步过渡到情感层次的深化,产生情感共鸣,进入情感交换的探索和稳定阶段。而这一阶段需要双方对所交流信息的译码和对彼此的动机、需求、兴趣、性格、世界观、价值观、定势的感知伴随着一致的情感体验,获取理解、认同、支持。这种非理智性因素的激发和“共鸣”与艺术化的语言载体是有共同的特质的。因为通过艺术强烈的感染性,使参与者在诗情画意般的艺术享受中不知不

觉受到情绪的安装、情感的净化和情操的升华。因此,成功的宣传动员应当“动之于情、晓之于理、导之于行”,并且知、情、意、行相互交融、层层推进。苏区的艺术化语言载体运用抓住了“情感”这个特点,通过音乐、歌谣、戏剧、舞蹈、话报、双簧等艺术分享、艺术联欢等形式将人们首先从感情上紧紧联系为一个整体。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人们就相对容易形成价值共识,进而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深层次的政治认同。正是因为苏区歌谣、戏剧等文艺具有“以情感人”的特征,使得语言类载体甚至能跨越政党、文化、性别、年龄、时空等诸多沟壑,将原本看似没有交集的人和心串联起来,将不同的意见协调起来,将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从而形成情感共鸣和思想共识。尼采说过,“在哲学之前很久,人们就承认音乐有一种力量,可以宣泄情感,净化灵魂,缓解愤懑”<sup>[19](P3)</sup>人的趋乐避苦的本能,人的求真爱美向善的天性,人的安全需求、归属需求、成就需求等,都离不开语言类艺术的辅佐与点缀,在苏区残酷的斗争时期更是如此。无论是部队还是苏维埃政府,都成立列宁室、读报队来沟通军民感情。边区苏维埃政府中,以区或乡为单位,成立了专职的化装讲演队或化装讲演团。这样的化装讲演团,一方面保持着“讲演”和“表演”双重特征,另一方面开始向戏剧化转化,创作演出“与当地群众血肉相关问题”的新剧目。这些专职化的化装讲演团,其性质几与戏剧无二致,但在苏维埃政府的各革命团体中,直至1932年仍然保持着早期“宣传队伍的化装讲演状态。”<sup>[21](P51)</sup>红军学校几乎每周要举行一次文艺晚会,演出各种自编的歌舞、话剧、相声和双簧等。石联星在《难忘的日子》一文中回忆,“晚会节目丰富多彩,唱歌、跳舞、双簧、清唱京剧、提琴独奏、口琴独奏。李伯钊同志的苏联《农民舞》和沙可夫同志的独唱,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

艺术化的语言表达或语言载体的艺术化作品作为宣传鼓动的教育载体,它不是一种纯粹的逗乐工具,它要履行的主要职责不是引人发笑,而是让人在艺术带来的欢娱中有所思、有所悟、有所获。离开了教育性的内核和导向,文艺的娱乐性就会沦为纯粹的消遣和低级的享乐。周恩来也曾指出:“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从中得到娱乐

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他又说:“戏曲艺人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的责任”<sup>[22](P92)</sup>。这就是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文艺,其娱乐性必须始终与教育性相结合,必须始终为教育性服务。

### (三)价值灌输与思想启蒙相统一

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沃尔夫认为,语言决定思维,决定人对世界的看法,思想是受语言支配的,提出“语言是思想的塑造者”论述。学术界通常也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外在形式,思维是语言的表达内容。个人的语言与思维如此,社会同样有舆论的语言,舆论语言同样是社会的思维表现形式。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这个社会文化的语言表达形式和内容的综合体。

中央苏区时期,对于局部执政的中共而言,语言载体无疑成为中共最易掌控的表达和传播意识形态的“武器”,在这一“武器”的批判和鼓动下,民众能捍卫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并为此投身到革命实践的洪流之中。无论艺术的语言载体宣传,还是标语漫画的图文宣传,宣传的宗旨就在于此。当时中央苏维埃剧团的任务除了从宏观上争取文化传播运动的领导权外,精力也主要放在微观的操作层面。就“戏剧的技巧内容和表演方面”发挥其价值灌输和思想的启蒙的功效,真正帮助民众“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赞助工农红军的革命战争”、“发扬革命和斗争的精神,并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肃清封建思想,宗教迷信以及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文艺意识的坚决斗争”。<sup>[18](P30)</sup>苏区语言载体强调政治立场和价值灌输的基调是不难理解的。以政权更迭为始终目标的苏区艺术形式或传播载体无疑也应为此服务。但在价值立场的表达基础上,语言显然不能用语言的暴力去传达其立场和要义,而只能是“按照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塑造与培养人,促使人去追求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以此实现对现实的否定”<sup>[23]</sup>。也就是说,宣传教育的目的不能局限于引导人们适应现实的生活,还表现为引领人们创造未来的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开拓人生境界、指引人的自我超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等方面进行启蒙和教化。因

此,以语言为载体进行的鼓动宣传教育,它为人们提供的不是机械的科学知识,不是简单的逻辑判断,而是一种价值知识和感性判断。语言的交流和交往,一方面,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能够在社会一定范围中传播开来,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同;另一方面,社会的思想和价值也只有通过语言以感性形式或艺术的方式展现出来,才能被民众所理解,才能变成指导人们行动的实际力量,从而转化为现实。

## 小结

中共在民众动员中所运用的语言载体,以苏区歌谣、苏区戏剧、苏区音乐与舞蹈的影响最大。这主要归因于它们作为视觉或听觉艺术,能够在战争状态下,以极直观、极有效的形式在短时间内取得感动人的效果。除此艺术性的语言载体外,还有大量的谈话、讲演、呼口号、火线喊话、讲故事、说笑话的沟通性语言载体以及伴随着运用大量的副语言和肢体语言迅速快捷有效地传播着革命文化、革命情感和革命价值的红色文化,这其中语言载体所发挥和呈现的信息沟通、情感沟通和价值沟通的价值或特点并不是三个截然独立的部分,也并非前后相继的三个环节,事实上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共存、相互融合的。“信息沟通只有融入情感沟通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沟通,否则就可能成为单向的信息发布或单向的信息灌输;情感沟通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根本目的,但它是观念沟通的润滑剂;观念沟通是在情感沟通的基础上对沟通中的信息的提炼和整合,从内容到形式到条件都离不开信息沟通和情感沟通。”<sup>[24](P120)</sup>

在苏区的政治背景下,语言载体致力于达到毛泽东所说的“三个统一”,即“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sup>[25](P407)</sup>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语言载体具有鲜明特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过“左”的特色,不时出现了某些语言暴力现象,我们在承继革命话语表达的经验的同时,也应对语言暴力给予警惕和反思。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 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3] 邱仁富,贺争平.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发展的一般规律[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1)
- [4] 李卓然.战时政治工作[J].红星附刊,1934,(6).
- [5] 钟俊昆.中央苏区文艺研究——以歌谣和戏剧为重点的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6] 喻建章.从中央苏区到新中国——江西革命出版史料简述[J].出版史料,2005,(1).
- [7] 谢重光.土地革命时期闽粤赣苏区的客家妇女工作[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1).
- [8] 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苏区文学史编写组.江西苏区文学史稿[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62.
- [9] 李志民.奇兵制胜.星火燎原(二)[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1979.
- [10] 欧阳雅,万叶.中央苏区舞蹈史.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 [11]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李方准,梁民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 [12]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张闻天.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J].斗争,1932,(31).
- [15] 杨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J].斗争,1932,(2).
- [16] 杨尚昆.宣传队应该如何工作的一个实际例子[J].斗争,1932,(16).
- [1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 赣南师范学院,江西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二)[G].内部刊印,1985.
- [19] [德]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M].周国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20] 李寅寅.苏区舞台与群众性革命性运动.[J].南方文物,2002,(3)
- [21] 刘云.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M].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 [22] 周恩来.周恩来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23] 许凯.在社会转型时期构建高中德育新模式的思考[J].理论观察,2005,(6).
- [24] 姚迎春.思想政治教育的文艺载体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25] 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Revolution and Discourse: Language Forms and Feature about People Mobilization in Central Soviet Area

Tan Qi-hong, Xiang Xu-wei

(1.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2. Nanchang Normal College,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Language acts as an important transmission media and symbol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In the culturally underdeveloped Soviet Are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kes full use of various language art forms, such as folk music and dance, public speech, etc. to mobilize and educate the peasants and the masses. The language art forms fully represent unific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education, between emotional exchange and art expression, between value instillation and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It plays cognitive, adaptive, consolatory, encouraging and unified roles in the rapid transmiss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affect and value of red culture.

**Key words:** soviet area; mobilization; language carrier; form; feature

(责任编辑:石立君)